

唯物史观与启蒙和现代性

邹诗鹏在《哲学研究》2008 年第 6 期撰文指出，启蒙的最高也是最后的成就表现为宗教批判，但这其实是把丰富的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了；唯物史观则通过将宗教批判转变为政治批判，把现代性的本质把握为资本主义制度，从而真正

切入了现代性复杂内核，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成为观察、分析和批判现代性社会的哲学理论，其实质是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作为批判性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开启了，而且深刻影响着诸多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

然科学。但唯物史观与启蒙的本质区别，即对现代性社会展开实践批判的要求，也决定着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总体性的现代性社会理论，既非总括性的，也非实证性的。实际上，当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成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延展时，这种

观点所秉承的正是德国古典哲学式的启蒙逻辑；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历史唯物主义”就从唯物史观跌落为各种类型的教化理论，或者被盲目地拔高为某种带有实证特征的笼统的总体性人文社会科学，或者干脆被看成是一种实证社会学。

文明对话 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

景海峰在《社会科学》2008 年第 8 期撰文指出，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只有在充分地和各种文明对话、交流和融合之后，才能够真正谋求新的发展。而作为新文化之基础的哲学反思与建构，又必然要先行一步，因为有了自身的省思和自觉，才能够有大的担当。文明对话的背景需要我們做哲学的思考，同时也给我们认识自身的状况和清理有关的问题提供了最好的机遇。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深度反思过去和寻求范式突破的关键时期，由学科层层分割和研究领域之画地为牢所形成的僵固观念和习惯方式，严重制约了中国哲学的创新与进步，如何打破中哲、西哲、马哲之间的重重壁垒，在颇显零碎而又隔膜视阈之内重塑中国哲学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急迫任务。新的中国哲学系统的整合与构建，特别需要包容的气度、开放的胸襟和不断的反省与调适，而开展文明间对话。在不同文化系统的相互激荡之中重新确立自我的身份性，找准自己的位置，可能是进行有效之建设工作的重要一步。换言之，只有在文明对话的互动和锻炼之中，中国哲学才能够走向世界，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大禹治水
遇难题

摘自《新漫画》

功利论与道义论的对立及其超越

方毅在《学术交流》2008 年第 8 期撰文指出，功利论和道义论都是以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对立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强调的是个人利益，认为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道义论强调整体利益，忽视甚至扼杀个人利益和个性发展。由此，二者在外在的功利价值和内在的精神价值关系上是对立的，在工具性和目的性的关系上也是对立的。功利原则把行为所获得的功利

效果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道义原则把行为的道德根据归结为它本身的善及符合一定的准则和规范。因此，功利主义所提出的义务是实质性的；道义论所提出的义务是形式的。功利论是在工具或手段意义上使用道德的；道义论是在目的的意义上来谈论道德的。因此，功利论提出的是相对的义务；道义论提出的则是绝对的义务。集体主义道德避免了功利论和道义论的片

面性，实现了对功利论和道义论对立的超越。集体主义道德不同于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功利主义，“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集体主义道德的核心。集体主义道德也不同于以“群体本位主义”为基础的道义论，因为后者是用虚假的集体来压抑、限制个人的自由和发展。集体主义道德实现了外在的功利价值和内在的精神价值的统一，也体现了道德的工具性和目的性的统一。

观点集锦

公务员“亚腐败”现象透视

曾维和在《中共青岛市委党校学报》2008 年第 8 期撰文指出，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公务员腐败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各种“亚腐败”却在一些公务员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并有蔓延之势。所谓“亚腐败”是指与公务员职权相关的一切责任意识淡薄、谋取私利和浪费国家资产，有损其职业形象，但却没有明显犯法违规的思想和行为。“亚腐败”是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土壤，是腐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具有模糊性、私利性、普遍性和衍生性的特点和多种表现形式。“亚腐败”已经构成了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之一，违背公平、正义的社会准则。它的危害绝不亚于腐败，对我国党风政风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多元化、私人动机对社会职责的腐蚀、道德权威性的缺失与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是“亚腐败”产生的伦理原因。从伦理的角度治理“亚腐败”，一要树立公务员的正义观，二要铸造公务员的职业精神，三要培养公务员的责任意识，四要增强公务员的伦理自主性，五要筑牢公务员拒腐的思想道德防线。

乡镇社会工作人才的吸引办法

沈建乐在《唯实》2008 年第 7 期撰文指出，如何吸引人才，对于乡镇来说，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这里最主要的还是尊重人才，即有关组织和领导应努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使人才能够真正

体会到人情的温暖、组织的关心、领导的信任、关系的和谐，使人才有一个能干事业、能干成事业的良好环境。其中，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激励制度，做到将“薪”比心，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并让员工参与报酬制度的设计与管理。以良好的环境聚集人才，拿出重金奖励人才，从而提高对各类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要建立吸引社会工作人才的激励机制，并通过具有足够吸引力的激励政策，引导大中专毕业生、退伍转业军人、离退休干部投身到社会工作中来。建立好富有凝聚力的乡镇文化是吸引乡镇社会工作人才的长远之计。要切实加强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建设，改革文化管理体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要切实将乡镇文化建设纳入到乡镇发展的总体规划，纳入中心村建设指标，纳入全民素质教育工程；要加大投入资金，建立乡镇文化发展基金；要抓好地域特色文化，突破“狭义”文化的范围，拓展活动内容和形式，丰富乡镇文化生活。

30 年来学术研究内容的三大转向

刘曙光在 2008 年 8 月 14 日《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最近 30 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内容上有三大转向：1.从无批判或纯批判转向扬弃。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对待国外社会科学理论，是拒斥或者说纯粹的批判，仅仅把它们当作反面教材，当作自己的对立面。对待经典作家则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把他们的论述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全盘肯定、全盘接受，毫无怀疑也毋庸置疑，并以他们的论述来评判其他各种学说，因此，那时的评判难以做到客观、公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深入开展，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中国学者开始把政治问题和学术研究区分开来，开始融入世界学术研究社群，开

始与西方学者对话，他们开始意识到：每一个研究者及其学说都有其合理之处、可取之处，也有其局限性。因此，对待国外社会科学理论，我们一开始是译介，再后来是“扬弃”，真正做到“洋为中用”。2.学术视野从国内转向国际。在研究内容上，中国学者开始把眼光由国内转向国外。一方面，力图使中国民族性的东西国际化、全球化；另一方面，也把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中国化、本土化。3.学术史由通史研究转向专题和断代史研究，呈现向纵深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中社会风险的阶段性

段华明在《甘肃理论学刊》2008 年第 4 期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也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历程。30 年改革开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任务、深度和特点，所以呈现出不同的风险表征。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风险，是改革的理论主张与原有的意识形态发生尖锐冲突，突出表现为姓“社”姓“资”的争论。结构转型期的主要风险是市场经济深化所带来的各方面利益冲突。结构转型期是改革的攻坚阶段。整个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能不能协调、稳定地度过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风险在于，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可能出现社会失调。改革开放进展到新世纪新阶段，社会风险已经从局部风险走向全面风险，客观上要求应对理念的与时俱进，摒弃只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全面发展，倡导科学发展观，调整经济政策和社会分配政策，把经济发展观上升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观，把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扩充到可持续发展，提倡经济建设与环境和谐共处，人与自然和睦共存。从风险社会的视阈来看，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提出，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

夏增民在《南都学坛》2008 年第 5 期撰文指出，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从中外期刊出版比较 看我国早期期刊的出版

龚维忠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 年第 4 期撰文指出，中外早期期刊的出版均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演变，才逐渐发展到今天现代期刊的形式和规模。通过对中外期刊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在我国，杂志的集刊表现形式产生的历史较早，而当时的编辑出版者并没有意识到该出版物给我国纸质载体出版形式带来的创新与改革；其二，从学科基本概念上分析，杂志包含集刊与期刊两种出版形式，其实两者主要只是不定期和定期之区别。而在我国两者实际出现的先后仅相隔 41 年，虽然现代期刊的出版形式是从国外引入的，然而从出版表现特征上比较，也就是引入了一个“定期”出版的概念而已。其三，从目前我国纸质载体出版史料考证，毋庸置疑，在我国集刊的出版先于期刊。换言之，正是《吴医汇讲》的出版，将我国最早的中文杂志（集刊）出版定格于 1792 年，世界上最早的中文期刊出版在 1815 年，而在我国最早的中文期刊出版应是 1833 年。这一具有层次性的表述既尊重历史事实，也符合学科发展的实际规律，较为贴切和科学。

洋务派科技观对 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高庆节、黄丽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8 年第 4 期撰文说，洋务派对近代科学技术的认知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到他们在洋务运动时的行为实践和路径选择，并在科技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器物科技观、知识科技观和教育科技观，反过来在其科技观指导下进行了大量近代科技实践活动，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洋务派的科技观直接影响着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它既顺应发展了“新思想”，又对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从传统手工生产发展到大机器生产的转折点，在整体上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洋务派的科技观毕竟是在传统的、顽固的封建专制的藩篱下形成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是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意识；其次它的改良主义特色；第三它是在“中体西用”框架内形成的，是一种二重性的思想理论；最后，是其阶级属性等，都是导致其局限性的主要原因。

(文章均摘自《新华文摘》)